第三节 中央财经学院（1952年8月—1953年8月）

一、中央财经学院的筹办

中央财经学院建院之初，首先成立了筹委会，筹委会主任委员是著名的经济学专家陈岱孙，副主任委员是罗青，委员有楼化蓬、董锄平、孙揆一、李秋野、严仁赓、郑林庄、赵承信、陈达、赵锡禹、杨治安。

1952年8月23日，在中央教育部，由曾昭铨副部长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讨论并且决定了筹委会的任务是：研究并拟定专业系科的设置、学制和教学计划，以及人事、房舍、设备的调配等工作。

筹委会下设办公室，主任是后来在中财长期任领导职务的秦穆伯同志。

筹委会成立后，随即进行了紧锣密鼓的合并、重组工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经济系财经部分的人员陆续到达。辅仁大学校史大事记记载：“1952年9月15日，北京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正式合并，北京辅仁大学中文、西语、史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教育、心理9个学系53个班1123名学生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西语2个学系并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社会学系劳动组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经济学系合组成立中央财经学院。”

与此同时，中央财经学院的领导也逐步确立。学院设党总支，隶属于高教部党委，党总支书记秦穆伯，副书记何方明。学院院长暂缺，由副院长陈岱孙，罗青主持工作。

9月份，准备工作告一段落，学生正式开学。

二、三个校址，两处办学

清華、農大、中央財經學院開學

【本報訊】清華大學、北京農業大學、中央財經學院等三個高等學校，已分別在本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日先後開學。

這三個學校都是經過院系調整後建立的新型高等學校。

清華大學是由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工學院以及原燕京大學、山西大學、察哈爾工業學校等校的工業科系調整而成的一所多科性的工業大學。學生由上學期的三千三百多人增加到五千八百多人。

北京農業大學根據教育部在今年七月召開的全國農學院院長會議所決定的方案，進行了院系調整和課程改革。原來的十一個系中，除去森林系、農業機械系調整到其他高等學校外，共調整爲六個系。園藝、土壤農化、畜牧獸醫三系都各有兩個專業。這樣，就更符合了我國農業建設的需要。

中央財經學院是由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等四校的財經科系和原中央財政學院調整而成立的一所新型的高等財經學校。現在有統計、會計、企業財務管理、國內貿易、對外貿易、財政、稅政等七個專業，組成統計、會計、企業管理、貿易及財政五個系。此外還有銀行、保險、貿易、勞動四個專修科。

在各校的開學典禮大會上，中央教育部錢俊瑞、曾昭掄兩副部長，以及中國人民大學吳玉章校長、北京大學馬寅初校長、北京師範大學陳垣校長等，分別到各校講話，表示祝賀並勉勵師生教好、學好。各校師生也都在大會上表示要學習蘇聯先進經驗，保證教好學好，以完成祖國所交給的任務。

（綜合各校通訊組稿）

1952年10月28日，北京日报第二版刊登的中央财经学院开学的消息。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四合院 1956.06摄

现在的中央财经大学，多年来一直处于多处办学格局中，这可能是历史的巧合。中央财经学院成立时，也处在几处办学的状态。当时的校址有三个，一是西直门外四道口，一是西皇城根22号，还有一处是北京东城区的骑河楼。

西直门外四道口校址，也就是现在中央财经大学的所在地，因为当时尚在建设中，无法使用。到1953年10月新校舍能使用时，中央财经学院又被撤销了。新校舍归中央财政干部学校使用。新校舍能够使用时，将一部分房屋借让给人民大学，他们的马列主义研究班就设在此处，当时常有苏联专家坐轿车来教学大楼，给人民大学学生上课，许多干校学生感到很稀奇。整整两个学年，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学生和人民大学研究班的同学住在一起，直到1955年暑假，才彻底完成了人民大学的搬家工作。在学校保留的50年

代初期的档案中，我们经常看到学校的教师、学生旁听人民大学课程，人民大学与中央财经学院联合举办联欢晚会等记录。[1]

当时中央财经学院的办学场所实际上只在两个地方：

一个是西皇城根22号，就是最初中央税校的校址，可以算作中财的发源地。另一处校园是在北京东城区的骑河楼，那里原来是北京大学三院（法学院）的校园。关于这处校园当时的状况，可在北京大学教授、学者张中行的一篇文章中约略相见：

出（北大）红楼东行，到汉花园东口改为南行，过骑河楼东口外，过孟公府东口外，路西墙角立个高一米上下的石碑，上刻译学馆三个大字，是第三院的东北角，前行不远就是坐西向东的拱形院门。拱形大门上有房屋，不多，可是开了个银行，名北京大学学生储蓄银行，因为行长是马寅初，据说还颇有名气。进大门，左方是一座两层的口字形楼，其时用为学生宿舍；右方是操场，记得有平整的网球场，至少是二个；操场尽头，即西端，有坐西向东的两层楼，是教室。教室南侧，地势高起，上立个柱形的大理石碑，是三一八纪念碑。其南还有一座两层的楼房，推想也是教室。这两座楼后面还有空地，只记得靠南部有一个坐北向南的宽大建筑，是体育馆，五四运动时，曾囚禁被捕学生一千多人，长达三日。[2]

三、精英荟萃，名士云集

新成立的中央财经学院，一时之间，群贤毕至，名士云集，既有富有丰富管理经验的政工干部、老革命，又有学术造诣很深的学者，还有一些

1 档案资料：4-XZ-1956-7-3 。

2 张中行：《流年碎影》，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人，当时默默无闻，后来成为学界的风云人物。

中央财经学院档案馆保留的一份合并后的中央财经学院人员统计表显示，当时在学院工作的著名学者有陈岱孙、余肇池、赵人俊、戴世光、吴景超、陈达、周作红、罗志兴、姚曾荫、赵承信、郑林庄、张伟弢、饶毓苏、袁方、徐卜五、赵锡禹、杨承祚、崔书香、孙昌湘、董浩、李景汉、魏重庆、陈文仙等人。

在中央财经学院的教师群体中，有四类人尤其引人注目：

一类是已经享誉全国的经济学家。如时任中央财经学院第一副院长和财政系教授的陈岱孙[1]先生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还有经济学家魏重庆[2]等。

第二类是大名鼎鼎的社会学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取消了社会学系，大批学者开始研究经济学，因此许多著名社会学家被调整到中央财经学院工作，如陈达、李景汉、吴景超、赵承信、戴世光、陈文仙、全慰天等。其中中央财经学院筹委会委员、后任中央财经学院教授的陈达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3]还有中央财经学院筹委会委员、从燕京大学来学院任教的郑林庄教授，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工业化与农业化的大论战中，独树一帜，提出中国应该走既非农业化，亦非立即工业化，而是由乡村工业内生

陈达

1　见后“校长风采录”。

2　魏重庆（1900—？）原名震声，号西山。浙江诸暨人。192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26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研究社会学。1933年回国，1934年到北京，历任辅仁大学社经系、中国大学经济系教授。1946年至1948年兼任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1947年至1948年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1952年任中央财经学院教授。

3　陈达（1892—1975）是现代中国人口学的开拓者之一。1912—1916年在北京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学习。1916—1923年在美国留学，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长期执教于清华学校。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后，负责创办社会学系并任教授兼系主任。抗日战争时期随清华南迁昆明，兼任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和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1952年任中央财经学院教授。

工业化的“第三条道路”，名噪一时。[1]又如从清华大学来学院任教的吴景超[2]教授、从北京辅仁大学转入学院任教的李景汉教授[3]都是中国著名社会学家。

第三类是一些默默耕耘、厚积薄发、大器晚成的学者。例如：郑必坚，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1952年在中央财经学院工作。后调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期从事宣传工作；曾任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1979年参加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1980年后调到胡耀邦同志处工作7年。20世纪80年代后期，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1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世界性经济危机波及中国，中国经济发生严重恐慌，农村经济日益向下沉沦，为了挽救迫在眉睫的经济危机，国民政府发动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和地方政府领导人发动了乡村建设运动。围绕着如何进行国民经济建设和乡村建设，尤其是“如何救济农村”，再次发生了工业化与农业化的大论战。以吴景超、陈序经等人为代表的《独立评论》派强烈主张发展都市工业以救济农村，但不反对发展农业，不过认为光靠发展农业是救济不了农村的。而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主张振兴农业、建设乡村文明，刺激民族工业兴起，以期建设自给自足的乡村工业，走独特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郑林庄提出中国应该走既非农业化，亦非立即工业化，而是由乡村工业内生工业化的“第三条道路”。还有相当部分学者主张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复兴农村，振兴农业，救济农民；第二步是工业化与机械化。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任务未先完成，既谈不上乡村建设，也谈不上工业化。

2 吴景超（1901—1968），安徽徽州（今歙县）人。1915年考入清华学校，1923年赴美入明尼苏达大学就读，获学士学位。1925—1928年入芝加哥大学，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任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31年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并进行城市经济调查。1935年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1947年返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52年任中央财经学院教授。

3 李景汉（1895—1986）北京通县人。1917年赴美国留学，专攻社会学及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先后在珀玛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获学士、硕士学位。1924年回国，任北京社会调查所干事。1926年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社会调查部主任，兼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1935—1944年历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国情普查研究所调查组主任，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教授等职。1944年赴美国国情普查局进修，曾实地参加美国农业人口普查。1949年开始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专家室工作，曾以专员身份赴东南亚各国进行考察，并兼任东南亚许多国家的农业普查顾问。1949年以后，任辅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1952年任中央财经学院教授。

副总干事。90年代初，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分管研究世界政治和经济的7个研究所，参加了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选集、文选和文集的编辑与宣传工作。郑必坚后来致力于研究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国如何重新加入世界、适应全球标准、为全球秩序做出积极贡献。 他也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的整理执笔人，参与了1982年后历次中央大会文件的起草，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著名专家之一。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再比如：中国近代史专家尚明轩，1952年在中财工作，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北京大学孙中山思想国际研究中心顾问、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及其研究中心顾问、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会顾问、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顾问等。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和对孙中山、宋庆龄等人物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孙中山传》（有日、朝鲜、蒙、维吾尔、哈萨克等文译本）、《廖仲恺传》、《宋庆龄传》（合著）、《何香凝传》、《孙中山与国民党左派研究》、《孙中山及辛亥人物论丛》等等。

第四类是在应用经济学科方面，对中财日后的教学科研产生重大影响的学者。例如：中央财经学院筹委会委员、从北京辅仁大学转入中财任教的著名会计学专家赵锡禹教授[1]；从1952年就来中财并长期在中财任教的

1　赵锡禹（1901—1970），河北乐亭县人。1921年以优异成绩考入燕京大学英语系。1924年毕业后被燕京大学新闻系录取为研究生。1927年，赴美国留学，第一年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研究生学位，1928年9月转入纽约大学商学院学习，1930年，获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1930年回国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研究专员任务。1932年，回到北平，接受了辅仁大学的聘请，在经济系任教授、系主任，直至1952年院系调整，任中央财经学院教授、会计系主任兼企业财务系主任。赵锡禹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会计学家，在中国会计学界素有“南潘北赵”之说，前者是指我国著名会计学家潘序伦教授，后者就是指赵锡禹教授。1953年转到中国人民大学任财政系主任，并继续从事会计教学工作。1960年后，他在人民大学任图书馆馆长和校工会主席等职务。1955年至1965年，他连续四届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并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北京市第二、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文革”期间，受到迫害，1970年逝世。

统计学专家崔书香教授[1]等。

四、办学理念和任务

中央财经学院成立后，根据高教部关于“高等学校宗旨”的规定，结合实际，确立了学院的任务：

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教育为指导，结合各种社会活动和实际生活的锻炼，树立学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

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具体情况，授予系统的“学用一致”的、财政经济的专门科学知识，培养学生善于掌握国家财经政策和熟悉业务技术的能力。

以富有爱国主义、劳动生产教育意义及养成集体观念的文娱、体育活动进行身心教育，健全学生的精神体魄，丰富学生的革命情感，使其毕业后能愉快地胜任祖国建设的艰巨任务。

表1-4 中央财经学院本科设置情况一览表

系别	专业及专门化
财政系	财政专业、税收专业
统计系	工业统计专门化、贸易统计专门化、农业统计专门化
会计系	工业会计专门化、贸易会计专门化、国家预算专门化

1 崔书香（1914—2006），河北省固城县人，193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商学院；同年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作研究生。1937年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系获硕士学位。1939年获哈佛大学瑞德克利夫学院经济学系硕士学位。1940—1945年任重庆大学教授。1947—1948年任北平燕京大学教授。1947—1952年任北京辅仁大学教授。1952年先后任中央财经学院、中央财政部干部学校、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续表

系别	专业及专门化
企业管理系	企业管理专业、企业财务管理专业；工业财务专门化、贸易财务专门化
贸易系	对外贸易专业、国内贸易专业

表1-5　　中央财经学院专修科设置情况一览表

科别	组别
贸易专修科	对外贸易组、国内贸易组、会计统计组
银行专修科	
劳动专修科	
保险专修科	
备注	修业年限2年

五、学院制度建设

中央财经学院虽然历史不长，但是在学校发展史上，它是具有启蒙意义的重要阶段，它教会我们什么是大学，什么是高等教育，什么是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如何办好高等教育。这也是共产党探索办高校在中财体现出的一个意外收获，是原有“延大”式大学正规化、“大学化”的一个标志。

学贯中西、极有学术造诣的陈岱孙院长，不仅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而且是富有办学经验的教育家，他的办学风格和人格魅力影响了学院，使后来者受益无穷；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人民大学调整过来的教师们，各有各的特点，带来了不同高校的办学理念和教学风

格；再加上中央税务学校的优良办学传统，三者合一，为后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以至中央财经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比如在制度建设方面，中财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这一时期，中财的规章制度无论从结构上，还是在内容上，甚或是遣词造句上，都有了飞跃式的变化。

中央财经学院成立后，即制定了《中央财经学院院章（草稿）》，共分为总则、学生、学生组织、会议制度、社团组织、奖惩、附则等九章。又制定了《中央财经学院学期成绩检查与升降级暂行办法》。

1952年10月26日，制定《中央财经学院附设文化补习学校章则（草案）》，作为中央财经学院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补习学校，至此也有了详细的细则。

六、管理严格的文化补习学校

在中央税务学校时期，我们就办过文化补习学校，中央财经学院成立后，制定了《中央财经学院附设文化补习学校章则（草案）》，中央财经学院撤销后，文化补习学校全部转给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文化补习学校存续时间比较长，不少人误以为它是一所夜校，或者是挂靠学校，实际上，它是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类似学校的预科班。

中央财经学院附设文化补习学校是依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以及教育部“工农速成中学暂行实施办法”设立的，“招收参加革命或产业劳动一定时期之优秀的工农干部及工人，施以中等学校的文化科学继承者适当教员，使其能升入财经学院继续深造，培养成为新中国工农高级知识分子及财政经济建设之骨干，其不宜升学者予以分配工作。”

文化补习学校面向工农，贯彻“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

教育方针”，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力求切合国家财政经济建设的需要以及工农干部的特点和要求。学校在录取时规定：“凡年龄在18岁以上35岁以下，具有一般高小毕业文化程度，身体健康并具有下列条件之一者，不分性别、民族、宗教、信仰，由原机关、工厂、部队等部门选送，考试及格者，均得入学。条件为：工农家庭出身或本人是工农成份的干部，参加革命三年以上者；非工农家庭出身，本人又是非工农成份的干部，参加革命五年以上者；工厂、矿山、农场等产业部门的青年工人，三年以上工龄者；参加革命三年或五年以上，政治质量较高，有培养前途的警卫员、通信员及个别公务员；有特殊情况的烈属、军属，经上级批准者。”这个招生对象的要求，也是严格按照国家要求制定出来的。至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高教部、教育部联合发出的《关于1953年工农速成中学招生工作的指示》中附录的《关于1953年工农速成中学入学条件的规定》中，这个要求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1]

文化补习学校的领导、组织管理人员，都是中央财经学院的教职工。学校设中学部、初级班，学制分别为3年和2年。学校有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制度规定细化到“先提问题，再叫学生；同学回答问题后，指明优缺点当场记分；学生提问，不经教师允许没有发言权”这样的程度。学校实际授课时数，每学期20周，每周6个学习日，每日学习不少于8小时，不超过9小时。开设课程为：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生物、物理、化学、政治、俄文、体育。学校有严格的学籍管理制度。

文化补习学校特别规定“凡本校学生一律实行人民助学金制”，“本校毕业学生，一律考升财经学院，不宜升学者，予以分配工作”。[2]现在没有当时中财文化补习学校毕业生升入本校的人数统计，但是有资料显示，当时国家第一届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的升学率高达96.55%。

1　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办公厅编：《高等教育文献法令汇编》（第一辑），第223页。
2　档案资料：3-XZ-1952-7-1。

七、组织、人员概况

1952年12月2日，政务院第160次会议任命陈岱孙、罗青为中央财经学院副院长。秦穆伯任党总支书记（学院当时没有设党委，学院党总支隶属高教部党委）。

组织机构：

院长办公室，秦穆伯兼任办公室主任，下设人事科、秘书科。

教务处，下设教务科、注册科、图书馆、体育室。

总务处，下设总务科、会计科、生活福利科、校产管理科、工程科、卫生科、医务所。

各系及专修科为教学行政基层单位，设主任一人，干事若干人。

学院教研室分为直属教研室和系属教研室，前者受教务长直接领导；后者受系主任领导。

学院社团，受中国共产党财院支部领导，如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财院委员会、教育工会财院基层委员会、各民主党派、学生会等等。

关于中央财经学院教职工人数，由于学院教职工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人数统计只能反映某一时的情况。

表1−6　　1952年12月教职工人数统计

职别	人数
教授	24
副教授	11
讲师	20
助教	40

续表

职别	人数
职员	110
文化补习学校教职员	10
医务人员	6
炊事员	44
技工	5
警卫	20
勤杂	66
总计	356

从统计数字看，当时学院的最大问题是人员缺乏，教学人员尤为不足，这与学院刚刚组建，院址分为三处有关。为了尽快解决这一矛盾，学院人事部门采取内部适当调整、上级配备、有关单位的组织介绍、家属申请、私人介绍等方法，多渠道引进人才和工作人员，经审查录用的人员，分配的重点首先是教学，其他部门次之。

到1953年1月份，学院教职工达458名。（注：当时实有学生1768名，比例为4：1，国家规定的比例为3.2：1）由于当时中苏关系密切，1952年底，学院花名册上还有多名苏联籍教师，如彼斯库娜娃和库次涅佐娃等，都在俄文教研室。

八、刚性化与人性化结合的人事管理

中央财经学院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人事管理工作逐步开展起来。

1952年底，大部分人员建立了档案袋，进行了编号，特别是建立了教学人员的学术思想卡片。

人事部门还建立了全体人员的较详细的卡片、人员登记表、考勤名牌。

在严格管理的同时，学院非常关心教职工的切身利益，按照国家的要求和规定，1952年10月29日至11月15日，用了18天的时间，学院进行了调整工资工作。这次工资调整是在院系调整不久，迁校尚未结束、教职工人员相互不太熟悉的情况下进行的，为了保证工作顺利进行，学院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充分准备，多协商，少开大会”的原则，分为准备、讨论、定案三个阶段。学院专门成立了工资调整评议委员会，吸收了各方面代表人物，包括民主党派。调整标准兼顾德、才、资历，特别指出：在“德”的方面，资产阶级观点很浓，在“才”的方面，多半是旧的一套，在“资历”方面，是以金钱买的学位等，就不应该照顾。[1]

这次调整工资工作基本顺利，教职工工资平均增加40.7%，高于全国高校教师工资增加18.6%的水平。[2]学院总结认为，学院取得的经验是：“一是领导负责，亲自动手，与陈（岱孙）院长、秦（穆伯）主任的亲自动员和掌握分不开；二是通过党团及群众大会和个别交谈，充分进行了宣传教育，强调处理好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适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所谓‘适当的’是不能搞的太激烈，否则就会丧失调整工资的意义，不利于团结。”[3]

学院还专门设立福利评议委员会，1952年第四季度，就有47人获得补助。

如何对待教职工中的高级知识分子，是一个现实问题。总的来看，学

1 资料来源：档案3-XZ-1952-7-1。

2 这个增长率参见金铁宽主编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一卷，第122页。

3 资料来源：档案3-XZ-1952-7-1。

院坚持了原则，掌握了政策，学院强调必须执行党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和统战政策，要做到改造，必须把团结搞好。学院认为，高级知识分子是在党的领导下将学校办好的主要力量，因此必须适当地照顾他们，使他们发挥积极性。例如，在调整工资中，有人甚至提出不承认教授们有任何德和才，主张把这些人一脚踢开，但学院还是坚持了原则，做了大量说服工作。[1]

九、教学概况

1952—1953学年第一学期，教学工作是在完成院系调整的基础上和继续进行教学改革的过程中进行的，教学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师资缺乏，这一学期共开设33门课程，其中19门课程是校外教员兼任的，学生方面也存在程度参差不齐的现象，再加上教学改革经验不足，难免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仍然有很大的收获，一份现存档案资料记录着当时总结的三个收获。

1.在学习苏联、学习人民大学的办学过程中，为今后如何办新型大学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2.稳定了院系调整以来学生的不稳定情绪，端正了学习态度。

3.进行了生产实习，在实践中验证了学校的理论教学。[2]

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后，就中国的高等教育而言，都存在着教学探索的问题，处在新旧高等教育的转型期，中央财经学院的探索者们不可能目光如炬，一下子就看准了今后行之有效的教学之路。以下是当时学院对第一学期教学的反思。

1　资料来源：档案3-XZ-1952-7-1。

2　在“中苏友好月”运动中，出现了我院的所谓反动标语事件，有人将“中苏友好万岁”改成“中美友好万岁”，还有人在苏联画报上画美国旗子，一直未查出。

其一，学院认为，新民主主义教育是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学方法，培养德才兼备、体魄健全、具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水平的国家建设人才。一般说来在思想上是明确的，但是，1952—1953学年第一学期，对于如何培养，考虑得是不够充分的，尤其对德、才、体三方面的有机联系是认识不足的，因为偏重业务学习，致使政治教育不能经常化，尤其是对学生的政治教育未能成为所有教学人员共同的责任，因此，在今后的政治思想教育方面，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组织所有教学人员和社团组织，密切配合，通过以教学为中心的各种形式，加强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

其二，学院认为，我们在教学改革方面，是肯定的、勇敢的，并且确定了学习苏联、学习人民大学的具体方向，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成绩的，但是也存在一些缺点，主要表现在：改革面比较广泛，没有采取有计划、有步骤地“稳步前进”的方针，没有结合我院的实际情况，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具体计划，重点试验、由点到面、逐步推行，今后需要改进。

第三，学院认为，对教学改革是思想改造的继续和深入，认识不足，对于学习苏联和人民大学的过程，就是无产阶级的、新的、进步的学术思想与资产阶级腐朽的学术思想进行尖锐而又复杂的斗争认识不足。这是今后领导上应特别注意的。

第四，对于制订教学计划的精神原则，如：广泛科学基础上的专门化原则；专业中各课程理论体系的完整和内部联系的原则；专业课程缩短时间集中学习的原则等等，掌握不够。在教学内容上，未能贯彻少而精的原则。

第五，尽管在培养师资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如：教研室集体备课、教员到人民大学学习、旁听等等，但是对培养师资工作仍然重视不够，必须加强。

这份档案资料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新整合起来的大学，中央财经学院在办学中，是一边磨合，一边推进的。这个总结性的资料有这样一些话比较耐人寻味：“因为偏重业务学习，致使政治教育不能经常化”；“对

教学改革是思想改造的继续和深入，认识不足，对于学习苏联和人民大学的过程，就是无产阶级的、新的、进步的学术思想与资产阶级腐朽的学术思想进行尖锐而又复杂的斗争认识不足”；“在教学内容上，未能贯彻少而精的原则”。这里面透出来的消息是值得分析的：首先是政治与业务的矛盾；其次是教学改革与思想改造的关系；再次是对“苏联模式”的认同度；最后是对“教学内容少而精原则”这种明显“干校化”速成教育模式的消解。这是当时办学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基本结束、对旧大学的改造全面铺开的时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改造旧大学的院系调整以及所谓“教学改革”（实际上就是推广“苏联模式”），是一脉相承的，即改造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进而改造知识分子的生态、改造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使知识分子完成由体制外向体制内的转化，改变天马行空的自由性格，去除“自满自负目无余子”的习性，一心一意、忠贞不渝地跟党走，为人民政府服务。但思想的转换与生态的改变是需要逐渐适应的，在这个并不应该很短的适应期里，就难免暴露出一些问题。院系调整后的中财，主持工作的实际上是民国时期已经名闻天下的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而学校又云集着众多民国时期的、有着欧美教育背景的学者和专家，在办学上就难免出现欧美教育理念与苏联教育模式的冲突，民国时期正规大学的办学方式与新中国的教育诉求和“延安式”办学思路的冲突。尽管这种冲突并非表现为对立的水火不容，但在适应期或磨合期，却也暴露出来上述总结中列出来的问题。

1953年3月16日，第五次办公会议扩大会议制定了1952—1953学年度第二学期教学方针与任务。

1．教学方针：根据教育部1953年对高等学校所提出的“整顿巩固、重点发展、保证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我院必须改进领导，深入地学习苏联、学习人民大学，本着加强团结、办好财院的精神，发挥高度革命责任心、创造性和积极性，群策群力，实现教学计划。

2．具体任务：加强师资培养；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等等。[1]

资料显示，这一学期的教学基本顺利。这一学期的办学目标与评价标准也比较单纯，那就是“深入学习苏联”。这是扩大的办公会议制定的方案，应该说是集体的决议，从这里看，至少表面上大家的思想比上一学期是统一了。

十、中央财经学院解散

还没来得及在第三学期更进一步地把学校办好，1953年的8月份，高教部（53）综财马字第30号通知下来，决定撤销中央财经学院，学生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我们只知道这是进一步院系调整的结果，没有资料显示一所大学为什么只办了一年就把它撤消了。从过来人的口述中我们至少得到两种无法证实的说法：一是说国家可能出于北京地区高校布局上的考虑；一是说院系调整来财院的一些教授们不太愿意在这里供职，因为这里的办学条件与他们心目中的大学相去甚远。

根据国家政务院、高教部关于全国院系调整的有关精神和具体决定，当时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学院、山西大学财经学院[2]三校调整委员会”，三校调整委员会会议决定，1953年8月中央财经学院正式解散，师资分散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钢铁学院、石油学院、林学院等院校。原财政学院、税校人员大部分留下承办中央财政干部学校。[3]

中央财经学院解散后，原中央财经学院所有之房舍，以及图书之一部分，划归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所有。中国人民大学代中央财经学院颁发毕业

1 档案资料：3-XZ-1952-7-1。

2 山西大学财经学院也同时被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

3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成立于1953年4月，挂靠中央财经学院。

证书，亦得使用中央财经学院院章及副院长的印章。

关于尚在建设中的四道口校舍的归属问题，有一番周折，现在看来，稍有不慎，可能失掉学校现在的家园。在建设新校舍的过程中，曾经成立“中央财经学院建校委员会工程处”的组织，并且刻有公章，但是中央财经学院撤销后，中国人民大学不愿接受该工程，所以一批熟悉工程情况的领导人员都被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接收。同时，1953年8月31日，中央财经学院撤销后，陈岱孙副院长和罗青副院长曾经向高教部及高教部部长马叙伦请示过善后处理事项，该文件以（53）院办字第76号发出，请示内容是：“由中央财政干部学校代为领导该单位（工程处），并且代管中央财经学院及副院长印章，在建筑工程范围内使用，至工程竣工后，代为报部撤销”。[1]

然而，1953年10月9日，高教部给人民大学和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发来马叙伦部长签名的批复文件，文件明确指示“中央财经学院并入中国人民大学后，其建校工程机构亦由中国人民大学接收，因此，你院院章、副院长公章及建校委员会工程处印章等，均应移交中国人民大学。”

收到文件后，中央财政干部学校的领导表现得极有远见，没有立刻行动。10月12日，学校有关领导在批阅文件时，指出：“在西郊产权未具体确定归属以前，该项印章暂不移交。”

10月21日，戎子和副部长兼校长，致函高教部有关领导，提出该项工程已接近完成，11月底即可全部竣工，现在交接，会影响工作。

11月16日，高教部回函，明确“仍由财政干校继续负责迄工程结束为止”。[2]

由于人民大学没有接，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没有及时交，使得西郊四道口的校舍有惊无险地保留了下来。

1954年3月28日，中央财政干部学校与人民大学签订了关于四道口

1　档案材料：4-XZ-1956-7-6。

2　以上参考资料：档案4-XZ-1956-7-6。

校舍房屋的分配原则，由中间直分，各住一半。7月26日，政务院要求中央财政干部学校让出二部校舍，初步决定：学校在8月10日前，将房屋空出，在四道口校部拨给另建9000平方米建筑的计划。8月1日至10日，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在10天内突击搬家，将二部家具全部搬至西郊四道口校部[1]；11月5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将政务院拨给的9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计划与人民大学在西郊四道口所占一半校舍相互交换，并签订了协议书。[2]1955年暑假，彻底办理了人民大学从四道口搬家的工作。

中央财经学院撤销后，原划归中央财经学院的文化补习学校，全部转给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图书馆藏书9.6万册之一部分转给中央财政干部学校。

本章小结

1949年到1953年，是学校初创时期，可以说是应时运而兴起，随时变而赋形。四年之间，校名三嬗[3]，学校的正规化、“大学化”的速度和程度都是可圈可点的。这是学校“大学性质”确立的时期，是办学思想确立的时期，也是办学传统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经验，对后来学校的发展，无论在积极抑或消极的意义上，都有着深重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校应时运而兴，为国家培养了大量急需的经世济用之才，可以说是彪炳史册，功在千秋。人才的急需，使得“百年树人”的教育无法那么从容，教育的志趣已经不是人格之塑造、学养之修为，而是人才之速成。知识理性被工具理性很自然地替代了，所以活学活用、速

1 档案资料：4-XZ-1954-7-1。

2 1996年编：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大事记，第6页。

3 严格地说校名有四次更换，但华北税校和中央税校实际上是一回事，又据当时知情人回忆，华北税校并没有挂牌子。所以这四年学校实质上的改变是三次，即中央税校（华北税校）、中央财政学院和中央财经学院。

学速用、因用而学、以用为高，成为当时用人者与育人者共同的诉求。同时加强政治教育，统一思想，不使旁骛，成为培养新社会建设人才的有效路径，这既是适应时事的政治需要，也是解放区大学传统的自然延展，人或谓："解放区大学对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中最大，也可称之为中国'高等教育灵魂'的部分，也许是有关马列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内容，……而这些正是解放区大学教育内容的精髓。"[1]

中财是新中国办的财经类高等学校，是中央业务部门主管的学校，与新中国其他高校一样，政府是唯一的办学主体，这在当时为了一个共同的建设目标——培养国家急需的人才，可以说是非常有效的制度形式，从政府到高校，对办学自主权的问题没有异议，或者说是处在一种"集体不意识状态"[2]。当时的确是上下如一体，呼吸若一气地为建设新中国不遗余力地快速培养人才，求"用"务实，成为当时教育的特色，中财在当时表现得尤为纯粹与突出，由税校而财政学院而财经学院，如此快速地提升，与当时的需要有关，也与其成绩突出、运转有效有关。

这一阶段最值得一提的是院系调整。院系调整在新中国高教史上是个较有争议的话题，无论中外，无论从何种角度，在当下的学术论著中谈到院系调整时，完全肯定的并不多见。但是从中财发展史上看，院系调整为其带来了很好的机遇，使中财的"大学化"、正规化程度向前迈了一大步。虽然因院系调整而创办的中央财经学院只有一年光景，但是这一年却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学者治校，制度规范，使中财由干训式办学模式向全日制本科专业教育迅速转型，尽管是一种单科性办学，而且"苏联模式"的烙印鲜明，但这是当时政治、文化大背景下的通病，无关中财办学宏旨。

"苏联模式"的影响是深远的，这在当时中财的教育教学中印记深刻。

1　（日）大塚丰：《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2页。
2　雷晓云：《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及其文化透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7页。

在当时“以俄为师”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苏联模式”的公行，也是一种“集体不意识状态”。刘少奇在建国后不几天的一篇讲话中说：“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我们只有在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例如：经济学、银行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等。”[1]中财在那时的教育教学模式以及教材建设诸种教育行为，不能不以苏联之马首是瞻。其实，当时学校的单科办学、部门办学、专业细分、组织形式、管理形式都不同程度地照搬“苏联模式”。当时不可能向欧美学习，也不可能接受民国方式，所以高等教育的养成，一方面依赖“延安经验”，一方面仰仗“苏联模式”。无论现在对“延安经验”和“苏联模式”怎么评价，这两方面的影响都铸就了中财求“用”务实的办学传统。

1 见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第4页。